

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

程霖,岳翔宇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4)

摘 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以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为基础引进了大量外来先进思想,并通过对其学习、选择与变通来实现传统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这不仅为后来中国金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人才和经验,也推动了本土新式金融事业和制度建设的发展。文章在考察了晚清金融思想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原因、模式、过程和特点后认为,经济发展需求是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西方金融思想的传播从外部提供了激励和参照,而开放的环境则是这一转型的前提条件,这也构成了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模式。传统金融思想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若干经验教训即便在当代中国也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传播;晚清;金融思想;金融制度;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4)06-0060-12

古代中国曾在金融思想领域取得过光辉的成就,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但因受所依托的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限制,也存在着分析视角、范式、方法及问题聚焦等多方面的局限。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加速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形态的内在变革对新式金融及其思想提出了新的要求,进而推动了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在此过程中,西方金融思想(包括金融理论与制度知识)的传播也从外部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激励和参照。这一影响深远的转型不仅是中国传统金融思想现代化的肇始,还对本土新式金融事业和制度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其过程也存在一些方法与效果上的局限。深入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有助于深刻揭示晚清乃至整个近代中国金融思想的演变规律和特点,还有助于在新时期更科学地引进和借鉴西方金融理论,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然而,以往的近代经济史学研究对这一主题却缺乏系统梳理。晚清金融思想史的研究或偏重于介绍晚清金融思想的具体内容,未能深刻揭示这种思想转型与各种内外因素之间的关系(程霖,1998;叶世昌,2003;杨锦銓,2006);或偏重于厘清西方金融学说传播并发挥影响的过程,而不是以考察本土思想的转变为核心(程霖,2005;翟海涛和何英,2008)。有关晚清经济和金融史的研究则甚少涉及理论和思想层面(杜恂诚,1991;孙建华,2008;燕红忠,2012),或至少未曾关注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的金融思想现代化进程(林满红,2011)。这就为本文的讨论留下了置喙的余地。本文以晚清金融思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为考察对象,并将其置于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之下,深入挖掘其发生过程中各种内外因素间的相互影响

收稿日期:2014-03-01

作者简介:程霖(1963—),男,湖北罗田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岳翔宇(198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和合力作用,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了这一转型的目标、原因、模式、过程和特点。笔者认为,开放的环境是思想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就是在开放经济和文化交流环境中由内在经济发展需求和外来金融思想激励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和结构复杂的大国,因此金融思想的转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因循”与“变通”兼顾的渐进过程,其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人态度的转变,而且金融思想的转型和落实需要各领域全面改革的配合,因此中央政府的认识转变和政策推动也至关重要。这也是晚清金融思想转型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现代化趋向及其主要标志

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实质和目标是传统金融思想的现代化。为适应新式经济形态和发展趋势,中国传统金融思想必须谋求转变,通过建立新的金融理论与学科体系,为新式金融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一)传统金融思想的成就和局限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金融思想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闪耀着天才的光辉。其中货币金融领域的学术讨论和政策思想尤为发达,堪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例如,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有单旗的“子母相权论”抨击通胀政策的实质是变相夺取民众财富;《管子》提出了含有货币数量说思想的轻重理论,分析了货币、谷物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间的动态均衡关系,主张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物价。宋朝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体系,当时学者如沈括和叶适等更是对货币流通速度和劣币驱逐良币等问题有过精辟论述。此外,南宋和明清的“称提之法”以及元代的《钞币条画》等纸币管理思想也体系完备、内容丰富。

中国传统金融思想的这些成就不仅为中国学者所总结和称道(胡寄窗,1981;叶世昌,2003),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现代经济学家的承认和赞誉。例如,哈耶克曾多次引述中国古代人的货币金融见解作为其货币非国家化理论的支撑,熊彼特则称赞中国古代的货币管理方法“无疑曾受到文化修养远比我们高的人的注意和讨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图洛克也曾高度评价中国古代货币政策的成功。^①

但前述中外学者并不否认中国的传统金融思想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局限。例如,传统金融思想多混杂在政治和哲学的定性讨论中,在论证中不重视展示逻辑推理过程;未能发展出定量方法、科学范式与明晰的学科边界;分析视角多以君主而非个体为本位,致力于寻求问题导向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或制度安排,缺乏从微观经济基础出发的、自下而上的思考,并长期受制于贵义贱利、重本抑末和黜奢崇俭三大传统教条;很少系统地讨论工商业者关注的信用制度、风险配置方法和国际金融等问题。不单金融思想如此,中国经济思想整体的价值观与分析视角都迥异于西欧,现有研究多将这些差异归因于中国古代的特殊地理禀赋,及因此而产生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外贸依存度低等政治、经济特点。^②

(二)晚清金融思想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和标志

1840年以后,中国传统金融思想的上述局限日益凸显,无法与新式经济形态和发展趋

^①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0页;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0页;Tullock G: Paper Money—A Cycle in Catha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7, 9(3): 393—407。

^②胡寄窗:《政治经济学前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6—577页;启良:《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比较研究》,《世界历史》,1988年第3期,第12—22页;唐任伍:《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74页;马涛:《大分流:18世纪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的反思》,《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1—8页。

势相适应,亟待转型求变。思想界希望通过建立新式的金融理论与学科体系,为新式金融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以此为方向,这一转型有四个重要的标志:

一是为金融思想建立了微观理论基础,改变了以国家为本位的传统分析视角,进而拓宽了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内容。例如,洋务运动时期的胡燏棻和戊戌变法前后的陈炽都呼吁建立自主的银行体系并统一币制,^①但前者的讨论是传统思想加新金融知识的混合,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后者的《创开银行说》则以西方经济学原理中货币和商品的循环为微观基础,自下而上地解释银行作为经济枢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和作用,比前人的分析更清楚、全面,已探“货币银行理论之藩篱”(胡寄窗,1984)。这种分析视角的转变,使得晚清金融思想由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工具转型为能够解释金融现象、指导金融实践和制度建设的、更有价值的理论体系,开始对一些过去很少重视的领域(尤其是发展工商业需要关注的风险配置和国际金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讨论,而不再局限于货币政策和物价调节等曾取得光辉成就的传统主题。例如,在庚子事变前的60年(1840—1899年)中,讨论金融问题的报刊文章大约只有700篇,其中绝大多数讨论的都是货币金融和政府筹资等传统问题;而在晚清政府的最后12年(1900—1911年)中却有2758篇报刊文章讨论了金融问题(图1),涉及货币银行、国际金融、证券和保险等多方面。

二是开始重视定量方法和逻辑推理,改善了分析工具。传统金融思想以模糊的定性讨论为主,一方面缺乏与数量方法的结合,导致规范分析与经验实证分析脱节,削弱了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不重视推理过程的展示,削弱了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可复制性。但到清末时,我国学者虽因现代统计制度的缺乏尚无法结合本土经验数据进行金融分析,却已能在讨论问题时借助欧美实例,并能较好地模仿西方金融分析中的演绎和归纳等方法。^②这表明传统金融思想已经在数量和逻辑分析方面有所进步。

三是发展出较为明晰的学科边界和现代化的术语体系。在著作方面,清末新政前后出版了25部金融专著(见表1和表2),结束了金融思想混杂于其他领域著作的历史。在教科研体制方面,1904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把大学分为8科,在商科中设立了“银行及保险学门”(相当于现代的一级学科),并将银行业要义、银行论和货币论等列为主课。^③在专用术语体系方面,19世纪中后期中国学者开始了西方金融术语本土化的尝试,这些开创性的贡献对中日两国均曾起到深远的影响(程霖,1998);20世纪初的留日浪潮使日本化的金融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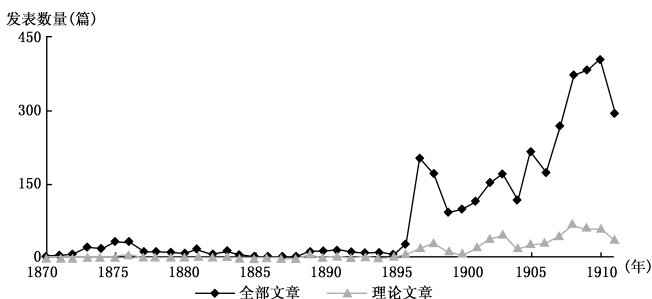


图1 晚清时期金融报刊文章发表数量:1870—1911年^②

①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7—290页;陈炽:《续富国策》,载于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8—189页。

②整理自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和大成老旧刊数据库,1870年以前国内并无金融相关报刊文章。

③例如,1904年4月5日某佚名学者在《大陆》上发表的《银行纸币》一文,就以古典货币理论为基本框架分析了兑换券的作用、特点及其益处,并结合欧美的数据实例加以说明。

④详细讨论见戴金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179页;张亚光:《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72—78页。

语开始在中国流传并产生较大的影响(如金融、证券、投资等)。这标志着传统的金融思想已经历史性地转变为独立的金融学科。

四是发出建立新式金融体系和制度的吁请,推动了本土金融事业和制度建设的发展。倡议发展新式金融事业和制度建设是本时期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较具代表性的有太平天国时期的洪仁玕和容闳建立西式金融企业和制度的主张以及洋务运动时期的盛宣怀、郑观应和陈炽等不断鼓吹建立新式金融企业以促进本国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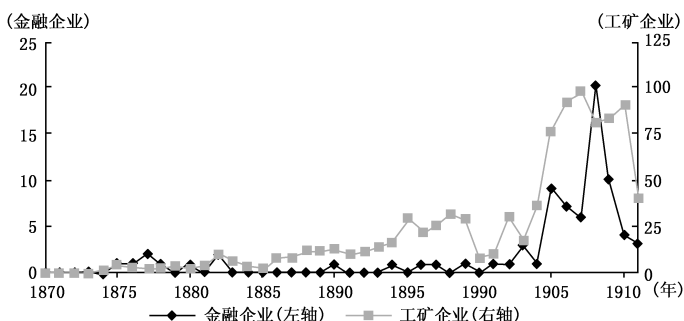


图2 晚清时期新式工矿企业与金融企业新设立数量:1870—1911年^①

商业的发展、改善财政与国际收支和抵制外国经济金融侵略的要求。^② 这些努力最终不仅促使晚清创设了中国本土的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等数十家金融机构(图2),为新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资金融通和风险配置等服务,使其减少了对外国金融势力的依赖,也推动了多部现代化金融法规的颁布和金融监管制度的建立,实现了我国金融建设的历史性突破。

二、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内外动因与前提条件

晚清金融思想现代化转型的发生并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首先,经济发展需求是这一转型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转型发生的根本原因;其次,西方金融思想的传播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外部推力和示范、参照与激励的作用;最后,开放的经济和文化环境是这一转型发生的前提条件。既往研究偏重于单一线索或视角的描述和梳理,不利于深入挖掘其发生过程中各种内外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合力作用。

(一)经济发展需求是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内在动力与根本原因

尽管中国很早便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真正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是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被迫的口岸开放和通商引入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后者逐渐控制了中国金融市场和政府财政(汪敬虞,1983);本土新式企业亦不断生长。在这一经济转型和开放过程中,新生产关系的要素逐渐嵌入旧的生产关系中,自然经济趋于瓦解,而银行、保险等新鲜事物不断出现,根植于传统经济下的金融思想与西方金融思想相比显得陈旧落后,对开放经济中新的金融问题也缺乏解释力和指导作用。处于弱势地位却不得不接受现实的中国人大受震动,无法再痴迷于旧的经济金融见解。

在这一过程中,国人逐渐对发展新式经济及其配套的资金融通、风险配置和平衡汇兑等金融体系和制度的重要性有了一定认识,产生了了解和效仿西方金融理论和实践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要求,转变了传统的金融观念。从图2可以明显看出,晚清时期新设

^① 主要根据杜恂诚(1991)和孙建华(2008)的研究整理,不含官钱局和保险互助会。

^② 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3页;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卷一,武进思补楼1939年刻本,第14—17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270页;陈炽:《续富国策》,载于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2—268页。

工矿企业数量的增长通常先于新式金融企业的发展,其内在逻辑是晚清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金融需求首先促进了金融思想的转型(如发出建立新式金融企业和制度的吁请等),后者又通过在新式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过程中起指导作用而最终得以落实。

外因是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条件,但总是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后者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金融思想的转型也不例外。在鸦片战争之前便已有许多来华传教士试图传播包含金融理论和制度知识在内的各种新思想,但收效甚微(谈敏,2008),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才凭借洋务派提供的平台取得一定成果。毕竟,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决定了经济思想家所面临的问题集合,并由此进一步影响了对特定经济思想产品的需求(蒋自强等,2003),外来思想也只能通过满足这一需求来推动本土思想的演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需求才是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根本动因。所以,第一部包含西方金融理论的中文书籍《富国策》并没有首先连载于成立早、影响大的传教士组织机关刊物《万国公报》上,而是由本土洋务派倡议建立的京师同文馆翻译出版并成为教材。第一部汉译金融学著作《保富述要》由洋务派主持的江南制造局而非教会书馆组织翻译和出版。这种由自发选择主导的学习和应用,要比单纯外部力量的推动更能有效地实现西方金融思想传播与经济发展内在需求的有机结合,从而更好地促进本土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

(二)西方金融思想的传播是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外部激励和参照

外来异质思想的传入虽不是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根本动因,却也从外部为这一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激励和参照。以清末新政为界,西方金融思想的传播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840—1899 年。鸦片战争后一些与西方有直接接触的官员、留学生和民族资本家主动学习并传播西方金融思想,为求国家富强而发出了建立新式金融制度的吁请。与此同时,一些新教传教士通过著作翻译和办学讲课将各种西方学说传入中国,目的是打消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信,使其了解西方同样有着繁荣的文明,进而有助于传教(Martin,1881)。

西方金融思想在第一阶段的传播主体以本土思想家和外国传教士为主,传播路径主要是自欧美至中国。在这 60 年中,共有 20 本与西方金融理论或制度知识相关的著作出版(见表 1)。14 部本土作品中并无金融专著,多数是在政论和文集中介绍西方金融学说和制度并倡议引进。而外国传教士则翻译了包含金融理论和制度知识的 4 部经济学、1 部金融学著作,还通过办学等活动积极传播金融知识。例如,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翻译的货币银行学著作《保富述要》(Money)是国内第一部金融理论书籍,对银行和信用制度作了很多介绍。此外,日本学者翻译的《农业保险论》也成为我国第一部保险学著作。

表 1 清末新政以前传播西方金融学说和制度知识的中文书籍:1840—1899 年

书名	性质	年份	责任者	书名	性质	年份	责任者
海国图志	博物志	1842	魏源	庸庵文编	个人文集	1886	薛福成
海国四说	博物志	1846	梁廷枏	弢园尺牍续钞	个人文集	1889	王韬
资政新篇	政论	1859	洪仁玕	盛世危言	政论	1894	郑观应
校颁庐抗议	政论	1861	冯桂芬	理财学	经济学译著	1896	谢卫楼(英)
弢园尺牍	个人文集	1876	王韬	保富述要	金融学译著	1896	傅兰雅(英)
筹洋刍议	个人文集	1879	薛福成	续富国策	经济论著	1896	陈炽
弢园文录外编	个人文集	1880	王韬	适可斋记言	个人文集	1896	马建忠
富国策	经济学译著	1880	丁韪良(美)	庸庵海外文编	个人文集	1896	薛福成
佐治刍言	经济学译著	1885	傅兰雅(英)	适可斋记言记行	个人文集	1897	马建忠
富国养民策	经济学译著	1886	艾约瑟(英)	农业保险论	金融学译著	1897	山本宽(日)

注:表中数据根据胡寄窗(1984)、谈敏(1995)、王扬宗(1995)、叶世昌(2003)、程霖(2005)和张晓(2012)等研究整理,下表同。

西方金融思想传播的第二阶段(1900—1911年),是以庚子事变的发生与清末新政的发动为标志的。后者在措施上多继承自戊戌变法,通过废除科举、改变人才遴选标准和派遣留学生推动了晚清的新学传播(曹南屏,2013),也对社会精英参与传统金融思想现代化转型形成了广泛的激励。此时,西方金融思想的传播主体为留日学生,其传入路径也变为自日本至中国。这11年中所出版的138部经济译著或论著中,有23部为金融书籍(见表2),仅留日、旅日的中国人便贡献了12部金融学译著和6部金融论著。这些著作普遍呼吁向西方学习,主张建立新式的金融体系和制度。例如钱恂的《财政四纲》就在介绍货币银行理论等内容的基础上,倡议建立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以使国家财政富裕。

表2 清末新政时期的金融专著:1900—1911年

书名	性质	年份	责任者	书名	性质	年份	责任者
财政四纲	论著	1901	钱恂	货币论	译著	1907	陈家瓚
政法类典·银行论	译著	1901	作新社	银行及外国为替	译著	1908	刘鹤年、梁震岷
政法类典·货币论	译著	1901	作新社	中国之金融	论著	1908	潘承镠
日本货币史	译著	1903	新民译印书局	金主币救国论	论著	1910	康有为
欧洲货币史	译著	1903	新民译印书局	银行制度论	论著	1911	李澄、谢霖
钞业略论	译著	1903	大学堂译书局	银行经营论	论著	1911	李澄、谢霖
中国国债史	论著	1904	梁启超	银行论	论著	1911	谢霖
国债论	译著	1904	王季点	币制原论	论著	1911	黄遵楷
货币政策	译著	1906	刘冕执	中国货币沿革史	论著	1911	刘映岚
公债论	译著	1906	戚运机	清国货币论	译著	1911	王黻炜
纸币论	译著	1906	唐宗愈	银行学原理	译著	1911	王建祖、吴忠熹
货币论	译著	1906	孙云奎				

在晚清金融思想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变迁虽然对传统思想提出了挑战和变革要求,但不能自发地产生与这些内在需求匹配的现代化分析视角和思想内容,而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条件等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产生局限的根源,而且多数都很难因西方的入侵而迅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历史惯性使传统思想或所谓“保守势力”首先是激烈地抵制和反对学习西方(胡寄窗,1984;张广达,1986),不可能直接推动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西方金融思想的适时传入,一方面为国人提供了理论思想上的示范与指导,在转型方向、分析视角、思想内容和学术范式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无可取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作为竞争性外力的推动作用。虽然晚清金融思想转型肇始于外部军事和经济冲击而非西方学说的传入,但在其转型开始且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西方金融思想的传播却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这种能够用于解释新事物和新规律的竞争性理论的出现,迫使国人打破中国数千年传统经济思想的体系框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寻求本土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变。

(三)开放的环境是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前提条件

如前所述,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是由内在经济发展需求和外来金融思想激励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可以说,鸦片战争后开放的环境是晚清金融思想现代化转型的前提条件。首先,开放的环境使中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接触成为可能,由此而来的冲击是传统金融思想转型的起点;其次,开放的环境使中外文化交流更加便利,也为西方金融学说和制度知识传入中国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外部激励和参照;最后,从长期看,被迫开放后的中国外贸依存度逐步提高,政治、经济结构开始发生缓慢的变化,逐渐改变了传统金融思想所依赖的禀赋环境,也改变了经济发展对金融及金融思想的要求。

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金融思想之所以长期裹足不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中,缺乏可以进行经济、金融与文化领域的交流和竞争的国际环境。对此,张之洞(1898)已有所认识,他指出,中西差距不是源自“西人智而华人愚”,而是因为一方面竞争性的国际环境导致欧洲各国在“群虎相伺”的环境中必须竭力追求“富强之政”和“格物利民之技能”,乃至“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另一方面则是欧洲各国“壤地相接”、文化交流方便推动进步,正所谓“家处通衢,不问而多知”,中国在大统一后长期“独处于东方”,邻国又普遍“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因此,即便“守其旧学不逾范围”也可“治安而无患”,以至于“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绌矣”。^①

事实上,现代化进程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自生自发和单独进行的,而往往是一个世界范围文化的集合、文明对话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特点,西欧也不例外。汤因比(1966)和布罗代尔(2002)都曾指出,西欧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伊斯兰文明和亚洲的文化、技术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不可或缺。尹保云(2006)进一步总结指出,现代社会是在西欧这一地区而非其传统社会母体中孕育出的,西欧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聚集和融合现代性因素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说,封闭与开放的不同抉择曾是造成中西方金融思想分流的重要缘由之一,鸦片战争前的封闭状态造成了中国传统金融思想的长期停滞不前,鸦片战争后的环境开放则为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模式、过程与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晚清金融思想现代化转型的模式,即是在保持与世界经济、金融和思想接触的开放环境中,以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为基础引进外来先进思想,并通过对其学习、选择与变通来实现传统金融思想的现代化。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且传统思想根深蒂固,金融思想的转型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演进过程,以清末新政为界可将此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一)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起步阶段:1840—1899年

在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起步阶段,国人初步接触了西方金融学说和制度知识。在国人刚“睁眼看世界”的19世纪40年代,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代表,启蒙思想家开始在介绍西方经济文化情况的博物志中描绘和赞赏其银行和保险,但仅限于制度知识,并未进一步关注金融理论或提出建设新式金融的主张。太平天国时期,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洪仁玕和容闳虽有此类主张却无法落实。这虽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但更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化和对外开放还不曾达到一定程度,其对新式金融和新金融思想的需求还比较有限。

随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入侵不断深化,国人日益认识到时局的严峻性和学习西方的迫切性,向西方追寻治国救亡之道成为社会主流思潮。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催生了许多新式工商企业(图2),其现实金融需求推动了新式金融思想的发展。例如,洋务派首脑李鸿章关于“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②的金融建设思想与主张就是由洋务企业的风险配置需求所催生的;而贸易融资与国际收支平衡等金融需求也推动了自办银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等。^③ 此类金融思想的落实最终促成了第一家本土保险企

^①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菁华报馆本1898年版,(外篇)第1页。

^②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金陵刻本,第44—50页。

^③如1876年唐廷枢提议建立一家服务于国际航贸的中资银行,1886—1887年李鸿章在马建忠的极力鼓动下提出建立“华美银行”等。详细讨论参见程霖(1999,2005)。

业(1875年的保险招商局)和自办新式银行(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当然这一过程也难免出现波折,例如早期曾有些组建银行的计划,因资金缺乏或遭反对而失败。此外,洋务运动创办的教育和翻译机构还为西方金融学说正式引入提供了平台。

甲午战败宣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败于近邻日本全盘西化的“明治维新”,激发国人对如何进一步学习西方的问题做了大量讨论。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比洋务运动牵涉更广、改革力度更大却未能妥善落实,在反对势力的阻止下流产,但其中的一些实业、金融和教育政策为以后的思想变革与政策实践提供了经验和舆论上的准备与启发作用。^①

晚清金融思想转型起步阶段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开始介绍西方经济、金融理论和制度知识,并尝试着将其本土化,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对后一阶段的转型有重要影响;其二是将西方金融法规译成中文,作为呼吁建立新式金融体系和制度的基础,^②且部分倡议得到了局部落实,对新式金融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和指导作用。

不过,少数先行者的吁请并不等于全局性的转变,清末新政前的金融思想转型也有不少局限。首先,从金融建设过程中曾出现的强大阻力可以看出,这些发展新式金融的主张在当时仍属思想前沿,未在社会上形成广泛共识;其次,金融问题在该时期常从属于政治和经济范畴,仅有的两部金融学书籍也并非国人所译;最后,这一时期的金融思想从整体上看还属于传统思想加新金融知识的混合,分析视角多数仍以国家为本位,研究方法偏重于文字定性讨论,关注焦点仍主要集中于以货币金融和政府筹资为代表的现实问题等。

晚清金融思想转型在第一阶段进展较慢,并存在诸多局限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地方洋务派虽然兴建了一些新式企业,但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不够充分,导致未能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结构转换与广泛的新式金融需求,致使金融思想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不足;其二是当时的人才选拔机制并没有激发广大知识分子的参与热情,限制了西学的传播,致使金融思想转型的外部激励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传教士狄考文也曾批评中央政府对是否以新学为标准选拔人才的态度不明朗,使得有志青年只能观望,以免“屠龙之术成,枉费千金”。^③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前述两点都可归结为涵化(即异质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心态问题。中国曾不止一次被拥有异质文化的外族所击败,却从未丧失民族自信,因此能保持相对平和的文化交流心态。但鸦片战争的失败却动摇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前所未有又势在必行的文化变迁令人痛苦和难以接受。因此,许多国人采取了“分化”(separation)的态度,死守传统教条和回避新文化,只有少数先行者能试图寻求两种文化的“整合”(integration)。但即便是这些先行者,在向这些“蛮夷”学习的过程中也非常痛苦和矛盾,在支持改良的同时总要说西方文明与科技本来就“来自东土”,所以学习西方不过是“继往圣之绝学”而已。这种在戊戌变法前的先进思想家中几乎没有例外的主张,其实质是自我欺骗与麻醉(胡寄窗,1984),并不意味着他们全然发自内心地相信这种解释。^④

(二)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发动阶段:1900—1911年

①例如本时期的废除科举与官派留日,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9—36页;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21页。

②容闳于1896年首次将外国银行法规(美国1857年《国家银行法》)译成中文并拟成《请创办银行章程》呼吁创设国家银行。见宜今室主人辑:《皇朝经济文新编·商政》卷四,宜今室1902年刻本,第25—28页。

③狄考文:《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万国公报》,1897年第5期,第7—13页。

④文化变迁理论中常见的个体反应除了同化、分化和整合外还有一种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即将两种文化都抛弃的逃避主义态度(参见Berry J W: Acculturation: Living successfully in two cul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5, 29(6): 697—712.)但这种态度在晚清不具普遍性。

庚子事变后国内政治经济局势进一步恶化,晚清政府不得不全面推行“新政”和重启变法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晚清金融思想转型也进入其发动阶段(1900—1911年)。

清末新政落实了许多继承戊戌变法的政策,在财政、金融和教育等各领域实行了对西方的全面学习和模仿,这推动了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加速。随着科举的废除、人才遴选标准的变化和留学政策的深化,传统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得到了有志青年的广泛参与,进而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二阶段的短短12年中有23部金融专著相继出版(约每年2部,见表2),出版速度约为前一阶段(平均30年1部)的60倍,而且这些译著和论著在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和内容广度等方面也普遍超越前一时期,部分论者甚至能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尝试寻求一定的变通和创新;报刊文章的发表数量和讨论范围也都有进步。此外,“银行及保险学门”也成为了独立的学科。在这一过程中,倡办实业和促进生产的经济政策推动了新式工矿企业的发展,由此产生的金融需求推动了晚清金融思想的转型。而通过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本土金融思想在内容、视角和方法上都有所进步。这为发展新式金融和建设现代金融制度提供了有解释力与指导力的思想和理论,推动了新式金融企业的建立(图2)及新式经济和金融法规(如《钦定大清商律》和《银行通行则例》等)的制定和颁布。

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清末新政时期的金融思想转型也有一定局限性。首先,该时期内出版的大多数金融专著都是译作,少有应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金融问题的,说明国人对西方金融思想的消化吸收需要一定时间;其次,国人在著作和报刊文章中对于金融法关注较少,说明金融思想对于金融制度改革的理论指导还不够细致深入;再次,本时期国人的金融思想转型以对西方的模仿和变通为主,创新较少;最后,根据《全国报刊索引》和大成老旧刊数据库中的检索结果,这一时期有2758篇报刊文章讨论金融问题,其中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方面有1825篇,证券方面有779篇,保险方面有154篇。这可能是因为新式经济虽有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金融需求,但还远未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故与之有关的证券、保险等新式金融及相关金融思想还缺乏现实关照,国人仍比较重视与晚清政府的币制混乱和财政困窘紧密相关的货币、银行和公债问题,对新问题的研究还不是特别多。

(三)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特点

尽管存在着各种局限,但晚清的金融思想毕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并为民国及以后的金融思想演变和实践进步提供了思想和理论素材上的准备。这一转型有赖于开放环境下西方金融理论和制度知识的不断传播,也得益于本土经济发展提出金融建设要求的推动。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不是单纯照搬西方金融学说的过程,而是“因循”与“变通”共存的过程。在思想层面,国人对西方总结的基本金融原理以“因循”为主,晚清出版的25部金融专著中仅有9部为国人自撰。但模仿和学习并不意味着没有“变通”,20世纪初的晚清学者不仅已开始理解和运用西方金融理论,还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提出补充和修正。例如,严复翻译《原富》时就曾明确指出,金银之间的兑换比率波动是银本位中国在与西方诸金本位国家逐渐发展贸易关系的过程中发生“银荒”等国际收支问题的根本原因,需要实施币制改革。^①当然,这种变通与创新在晚清还不是很多。

第二,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转型紧密相关,在缺乏各领域变革的互相配合时会进展缓慢,因此其最终的推广与中央政府的认识、态度转变密不可分。例

^①严复:《原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55页。

如在转型的起步阶段,当时的教科研体制和人才选拔制度转型缓慢限制了西方金融思想的传播,而洋务运动又未推动全国性的、以新式经济为方向的结构转换,因此甲午战争前晚清金融思想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有所不足,外部激励又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少数先行者只能在孤独中“呐喊”。直到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在地方大员的推动下废除了科举制度,全面推广新式学堂并鼓励海外留学,普通师生才开始有足够的激励去学习和传播西方金融学说和制度知识。因此在传统金融思想转型的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态度转变至关重要。

第三,晚清国人对金融思想转型的态度明显体现出一个从“分化”到“整合”的渐进过程。起初,国人普遍试图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式的折衷来抗拒和拖延这种被迫的文化变迁,不愿触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本根”。直到同样曾苦于西方入侵、过去还曾向中国朝贡过的近邻日本通过向西方的有效学习实现了富国强兵,并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大清,此前在自我麻醉中进步缓慢的国人才不得不清醒过来,面对和接受现实,正视并学习西方的优势,积极寻求两种文化(包括金融思想)的“整合”,将外来的金融思想本土化。

四、结论与启示

中国传统的金融思想曾繁荣并富有成就,却因经济和政治的制约而裹足不前,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古老而闭塞的中国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都无法再独立于世界之外,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新局以及向西方的学习潮流。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既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新生产关系形成后的自然产物,也不单纯是“西学东渐”后西方金融思想在中国的简单复制和落实的结果,而是在经济发展内在需求与外来异质思想冲击的合力作用下逐渐演化而成的。这种转型的发生,其基本前提是晚清逐步开放的经济和思想环境。尽管这种被迫开放的过程充满屈辱,可是国人在认识和了解西方金融学说和制度知识后,却能够提出在中国进行模仿与应用的要求并经过努力逐步实现。事实上,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各方面都是如此不断学习和发展的过程。

在这种学习、模仿和变通的过程中,许多先驱者能够考虑到中国的一些实际需求,对西方事物进行有选择的消化和吸收——无论这一过程中有多少粗糙和盲目,毕竟标志着中国金融思想转型的开始。因此,晚清的金融思想转型有着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它不仅为近代国人开拓了视野和清除了思想障碍,为后来中国金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人才和经验,更为经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提供了足资珍视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今天更好地引进西方金融思想与理论,学习西方金融政策与制度,发展中国金融科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与启示:

首先,经济发展需求是金融思想转型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过于前卫或陈旧的思想都是无法落实的“空中楼阁”;其次,经济发展需求很难自动产生出与其匹配的现代金融思想,需要在开放的经济、文化交流环境中对外国先进思想加以学习、选择和变通;再次,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结构复杂的大国,因此金融思想的转型是一个取决于国人态度转变进展的渐进过程,需要兼顾“因循”与“变通”;最后,金融思想的转型和落实需要各领域的全面改革相配合,因此中央政府的认识转变和政策推动也至关重要。

* 本文获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

参考文献:

[1]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2]曹南屏.清末科举改制后的科举考试与新学传播[J].学术月刊,2013,(7):146—157.
- [3]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 [4]程霖.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4):50—57.
- [5]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 [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7]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8]蒋自强,张旭昆,袁亚春,等.经济思想通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 [9]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 [10]孙建华.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1840—1945[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 [11]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 [12]谈敏.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 1900—1949[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 [13]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 [14]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15]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J].中国科技史料,1995,(2):3—18.
- [16]燕红忠.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1600—1949):基于经济运行与经济近代化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17]杨锦銮.近代中国保险思想启蒙述论[J].湖北社会科学,2006,(10):78—81.
- [18]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 [19]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J].中国社会科学,1998,(4):59—71.
- [20]尹保云.对西欧现代化的“内源性”的反思[J].史学月刊,2006,(7):58—65.
- [21]翟海涛,何英.西方保险思想之“东渐”与中国民族保险业之创生[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12):33—36.
- [22]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冲突[J].中国社会科学,1986,(3):37—51.
- [23]张晓.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 191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24]Martin W A P.The Chinese,their education,philosophy and letters[M].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81.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ENG Lin, YUE Xiang-yu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4,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s, China introduced numerous foreign advanced ideas based on inherent deman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alized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thought through learning, selection and flexibility, which not only provided theory, talents and experience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ater Chinese financial thought but also adv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new financial undertaking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im, reasons, modes,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and argues that the deman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inherent dynamic and key reas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thought in the (下转第 94 页)

- [19] Mehra Y P, Sawhney B. Inflation measure, Taylor rules, and the Greenspan-Bernanke years[J]. *Economic Quarterly*, 2010, 96(2): 123—151.
- [20] Siviero S, Veronese G. A policy-sensible benchmark core inflation measure[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11, 63(4): 648—672.
- [21] Taylor J B. 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R].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993.
- [22] Taylor J B.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monetary policy rules[A]. Taylor J B. *Monetary policy rules*[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Which Price Index Can Provide More Inflation Information for China's Monetary Policy?

ZHOU Jian¹, LIU Shai-zhe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hanghai Branch of Industrial Bank Co., Ltd,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Present literature concerning China's monetary policy or inflation neglect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that which price index can provide more inflation information for China's monetary policy. This paper studies this issue for the first time. Based on Taylor rule, it introduces factors like interest rate smoothing and forward-looking and sets up dynamic reaction function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Then it compares information embodied in four types of inflation rate indexes by GMM. It arrives at the main findings as follows: firstly, CPI and RPI provide more inflation information for monetary policy than PPI and GDP deflator index, and RPI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CPI; secondly, there exists obviously smoothing behavior concerning China's interest rates; thirdly, regarding CPI and RPI as the indexes of inflation rates, the reaction function of monetary policy is robust in most of sample intervals, but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is unstable. The new findings above-mentioned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urrent inflation rate indexes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control through price indexes providing more accurate inflation information.

Key words: price index; monetary policy; inflation information; Taylor rule

(责任编辑 康健)

(上接第 70 页)

late Qing dynasty, the spread of western financial thought provided incentives and reference from the external perspective, and open environment was prerequisite for this transformation, forming the mod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thought transformation, many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lso have enlightenment ev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spread; late Qing dynasty; financial thought; financial institution;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 金澜)